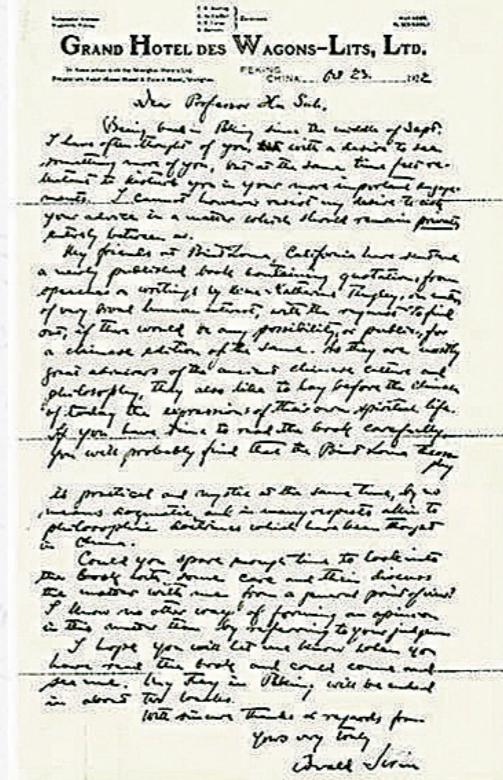


凭窗读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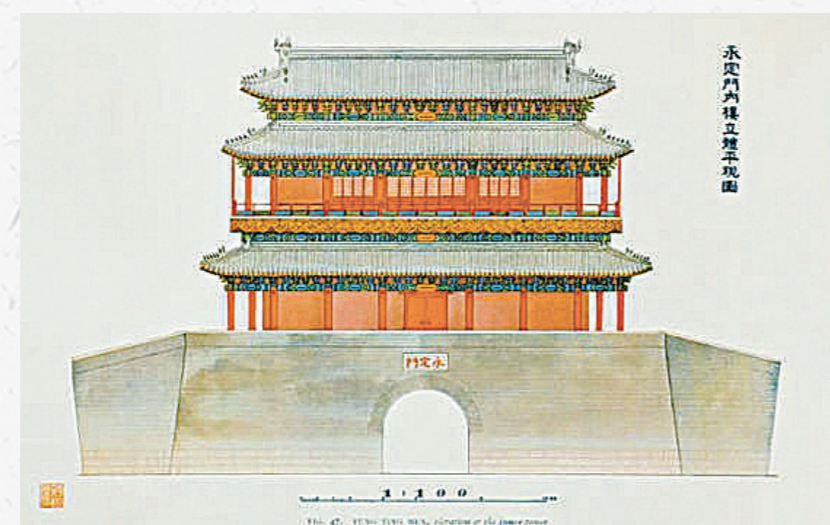
1922年拍摄的颐和园。



喜龙仁致胡适的信。

存档古都

——喜龙仁的六次北京之行(下)



手绘的永定门内楼立体平面图。

偏,故宫文物已经南迁,北京更是风声鹤唳。

他为衰败感到惋惜:“穿过紫禁城三大殿,发现它们比之前更加凄凉惨淡了。”但北京的魅力并未减弱:“它依旧拥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,每次你回到这个古老的地方,都可以刷新你之前的印象,这非常让人欣喜。”

在《中国晚期绘画史》的前言里,喜龙仁强调说:“在1935年,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些博识多闻的东方鉴赏家,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明清时期画家的宝贵知识,也得以在中国和日本的私人收藏里看到许多这些时期的代表性作品。”

据梁思成的好友童蒙记载,1935年喜龙仁访问过北平营造学社,而营造学社负责与欧美打交道的就是法式部主任梁思成。

为了体验胡同生活,他还在六国饭店附近的大阮胡同租了房。一张贴在屋前的照片,叼着烟斗,展现出瘦削而敏感的诗人气质,以及坚定而远大的学者抱负。

“您一定听说过大量关于日本对华武力侵略的消息。空中轰炸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加区别和大规模地进行。我们人民所受的苦难是极其惊人的。我们衷心感谢您为这个国家的受难者所做的工作。”

这封信是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北平沦陷后,于颠沛流离中写给喜龙仁的。在艰难环境中仍不忘联系,可见二人友谊之深。

不久,战争也摧毁了欧洲,但喜龙仁似乎未受影响,他在《中国园林》的写作中找到了安慰:“回看照片被他视为另一种旅行,一种逃避现实的神游。”

在斯德哥尔摩外的利丁厄岛上,他为自己建立了一座“东方花园”。

房屋远看同瑞典的普通木屋并无二致:平铺的折线形屋顶,三层楼高。但阳台用了坡屋顶,檐角微微上翘,并以青首装饰,这里还被戏称为“颐和园”。房屋内部,客厅的方格天花板上是彩绘的团凤,苏式月亮门分割空间,花园的台阶两侧还镇守着石狮子。

喜龙仁躲进小屋,回望那些在中国园林中漫游的时光,对“三海”(北京的南海、中海、北海)的记忆,尤其多愁善感:

“人来到这里,会感觉一种清冷孤寂,令你的内心敏锐地接收到古老回忆的低声细语,令你打开耳朵去聆听那些在春树着满苞芽之时,由春花谱就的和弦乐章所爆发出的无声之诗。人就如同漫步在被精心装饰而又空荡的舞台,尽管演员早已消逝不见,他们节日的欢乐也早已被一片沉寂所取代。”

第一本专著,在序言中,他写道:“如果我引起人们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,就感到自己对中国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。”

令他失望的是,这本书没有引起东西方学界的关注。在那个年代,城墙城门的话题太过冷门,几乎无人问津。800册书很快销声匿迹,仿佛从未存在过。

书的最后,他发人深省地问道:“这些奇妙的城墙和城门,这些北京绚丽多彩历史的无言记录者,它们的丰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?”结果一语成谶,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,北洋政府内务部开始大规模拆实皇墙。

次年,喜龙仁的《中国雕塑》出版,这本书一册为文字、三册为图片,涵盖了900多件石、铜、漆及木雕作品,为他奠定了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。

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期间,读过这本书。1930年他在东北大学教授中国雕塑史时,讲义中也大量翻译引用了这本书。不过,梁思成对喜龙仁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有严厉批评,称他“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”。

虽然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反响平平,但喜龙仁的第三本书,仍以北京为题。这种坚持,如同固执地为一位垂暮的长者记录生平。1926年出版的《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》共三册,以图片为主。在这套书里,他同样对那些危在旦夕的建筑表示了惋惜,并希望当局能意识到它们的历史价值,赶紧抢救。

林语堂盛赞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和《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》,“是两本最完全和最权威的再现北京的图集”。但在欧洲,喜龙仁却因这两本书饱受非议,同行嘲笑他出的都是图录书,不符合欧洲的美学审美,没有学术深度。



喜龙仁位于利丁厄的家(起居室内景),摄于1932年。

活跃于京城社交圈

除了走上层路线,融入圈子,也是喜龙仁迅速变成“北京通”的法宝。在学术圈,与他交情最深的要算胡适。

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叶公平,主要研究海外档案、学术史等。据他统计,胡适日记中至少有七次提到Sirén。“他俩是1922年春天认识的,直到1936年,胡适还在日记中提到两人一起吃饭。”

喜龙仁还没到北京,上海出版家张元济就在信中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了他,说他在英人俱乐部讲中国画,“报纸极为称赞不置。友人有意听者,亦倾倒之至”。蔡元培正求贤若渴,便邀请喜龙仁到北大讲堂演讲《东西洋绘画的要害》。

这场演讲由胡适担任翻译,两人由此相识。胡适英语流利,知识面极广,留美时的女友韦莲司又是学美术出身,他跟喜龙仁可以站在走廊里长谈几小时。

喜龙仁还曾在爱沙尼亚汉学家钢和泰家中与胡适会面。钢和泰是北京大学教授,精通梵文和藏文,家中常有中西学者聚会。钢和泰1927年给喜龙仁的回信手稿,今藏于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。

两人本来联系不断,十分热络,但胡适在1926年后就很少提及喜龙仁了。叶公平说,已经数字化公开的喜龙仁书信中,目前尚未发现胡适通信。

分歧很可能发生在1926年伦敦的一次会面。

据胡适日记,他们在伦敦见面,谈了几个钟头,喜龙仁还去听了胡适演讲,并陪他去大英博物馆参观。当看到一些中美洲的玛雅文物时,喜龙仁说,这里面有些与中国相近的“母题”。“我不很信此说”,胡适在日记中腹诽。

“两人观点冲突甚大,这大概因为喜龙仁是神秘主义者,而胡适信奉科学;喜龙仁对中国传统文化评价甚高,而胡适则认为中国人更需要学习西方。”叶公平认为,两人三观不合,所以后来就不怎么联系了。

最让喜龙仁如鱼得水的,还得是艺术圈和收藏圈。1922年,喜龙仁曾专程前往天津,拜访满清遗老罗振玉。

在罗振玉的寓所,喜龙仁观赏了其收藏的王维《江山雪霁图》摹本。这幅画后来成为研究中国早期绘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,收入喜龙仁的《中国早期绘画史》一书。

北京著名的鉴藏家完颜衡永(字亮生,又名王衡永、王湘南)也与喜龙仁有长期联系,并且是他购画的重要中间人之一。1935年,喜龙仁在北京六国饭店给妻子写信时说:“衡先生我想你还记得他,他跟我们一起吃过饭。他还问起你。我们刚刚一起看了我在上海买的很多画,他似乎觉得我这次的交易很幸运。”

此外,喜龙仁还与卢芹斋等艺术品商人保持着密切联系。卢芹斋是当时最著名的中国文物出口商之一,许多流失海外的中国艺术品都经他之手。喜龙仁通过卢芹斋,得以接触到大量珍贵的中国艺术品,这些藏品为他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。

与画家黄宾虹的交往更是一段佳话。黄宾虹在给傅雷等人的信中将他引为知己,感谢他对新安画派的盛赞,也称赞喜龙仁“能读古书、研国画理论”。

流连北京放弃教职

喜龙仁在北京乐不思蜀,大学却不愿再批给他更多假期了。从1922年春天,斯德哥尔摩大学与喜龙仁之间频繁通信,校长在6月警告他如果再不回学校,后果很严重。而喜龙仁为了在北京多住些时日,自愿请辞。

1923年4月1日,由于长期休假,喜龙仁被斯德哥尔摩大学免除教职。

喜龙仁在大学任教15年,对于一个出生于普通家庭,晚年被评价为“吝啬”的人来说,这至少是个经济上的重大决定。但他心意已决,要先完成对北京城墙和城门的书写。

在给朋友的信中,他写道:“我相信我的任务将会越来越专注于中国艺术,我必须完成我的那些历史书。我唯一的希望是在世界的这一头也能够找到一些讨论和学习的机会……但是我为什么要抱怨呢?从我过去的旅程中,我收获了那么多绚丽的回忆和有趣的材料。”

对于学术前途,喜龙仁似乎并不焦虑,1921年到1923年的中国游,已经为他的开山之作积累了足够的资本。1924年,他暂时定居巴黎,成为一名收入不稳定的独立学者。

1924年,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在伦敦出版,首印800册。这是他写中国的

由于不能用中文独立工作,喜龙仁曾自费聘请多位中国助手协助研究,其中最著名的一位,是后来成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泰斗的杨周翰。

1935年夏天,杨周翰经人介绍,协助喜龙仁核校《中国画论》英译稿。次年3月,杨周翰应邀离开北平,经伪满、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,又转彼得格勒、芬兰,最终乘船到达斯德哥尔摩,在喜龙仁身边工作了整整两年。

忆起这段经历,杨周翰说,他的工作就是把画论、画史、画家传、题跋、诗词等口译成英文,由喜龙仁写下来。由于他当时只有21岁,对古文略知一二,但对绘画一无所知,喜龙仁一边与他讨论,一边带他去英、德、法各国博物馆看中国画,颇开眼界。

鲁迅评价《中国早期绘画史》“虽然很贵(约40美金),然而我以为是很好看的书”。他还请三弟周建人以9元大洋的价格购买了一本,寄赠给寓居莫斯科的德国美学家艾丁格尔。

喜龙仁还是喜仁龙?

时间来到20世纪40年代末,侯仁之正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一天,他偶然走进伦敦一家旧书店,在尘封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泛黄的旧书,正是喜龙仁的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。

侯仁之“以重价把它买下来,通夜加以浏览”。他后来回忆:“我印象最深的,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,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。而他自己从实地考察中所激发出来的一种真挚的感情,在字里行间也就充分地流露出来。他高度评价这组历史纪念物,同时也为它的年久失修而伤心。”

侯仁之将书带回国内,每每讲起北京的城墙城门,都会向北大学生们介绍这本书。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成立后,他又郑重地把这本书交给了在文物局工作的学生,嘱咐他尽快翻译出来。1985年,该书中文版出版,侯仁之作序,印刷2万册。

此时,喜龙仁镜头下的城墙与城门,大多已不复存在。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百发到东南角楼调研后,一下子将剩下的2000册都要走了,逢人便送。这本书在研究领域名声大噪,但作者名字却被翻译为喜仁龙,从此以讹传讹。

20世纪90年代,叶公平读大学时,在杨周翰的回忆中发现,他用的是喜龙仁,于是做了一番研究。档案显示,国民政府1929年4月4日颁发护照时,写的是喜龙仁;与他交往频繁的完

颜衡永等,在往来的中文信中写的也是喜龙仁;张大千更是在喜龙仁八十大寿时,赠文给“喜龙仁博士”。

细究下去,这一乌龙在民国期间已经埋下伏笔:《北京大学日刊》称他是“西冷”,胡适称他是“西伦”,建筑史家童蒙在书中称之为奚伦、奚仑或Siren,还有学者称他是“喜龙士”。

“Oswald Sirén的汉名应为喜龙仁,在这个汉名中,‘喜龙’才是姓氏部分,对应他的瑞典语姓氏Sirén。”叶公平说,汉名如费正清,跟欧美人姓名的音译很不同,可以随便取。“龙”代表中国,而“仁”字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,选这两个字作为汉名,说明喜龙仁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。

2017年,后浪出版公司重译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,首次收录全部图片。随着作品进入公版期,他的其他著作也陆续出版,有媒体以“井喷式引进”来描述此景。

一个被遗忘了半个多世纪的名字,重回视野。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,喜龙仁的研究涵盖了中国艺术的大部分主要门类,包括绘画、园林、青铜器、雕塑、建筑。直到今天,仍没有学者可以在广度上超越这个百科全书式人物。

1956年,喜龙仁获首届弗利尔奖章,这被誉为艺术史界的诺贝尔奖。美国著名艺术史家高居翰评价说:“他在欧洲雕塑、园林、建筑、早期艺术等领域的专著举世闻名,为我们的研究积累了众多材料。”不过,他也酸溜溜地说过,喜龙仁是“最早来到黑莓园的采摘者”。意思是,他就像一位穿过黑莓地的人,采摘了所有容易摘的黑莓,让后来者只能摘那些难摘的。

1966年,喜龙仁在他的东方花园逝世,享年87岁。由于他晚年颇为节俭苛刻,甚至没有学生愿意为他写讣告,最后写出来的讣告也非用心之作。直到2013年,任教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芬兰艺术史学者米娜·托玛才为他写了第一本传记。

在这本传记中,米娜·托玛以为喜龙仁只有四次东亚之行。其实,1945年喜龙仁退休后,并没有停止游历与写作,他在1954年和1956年都来过中国,一共六次赴京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奠基人王逊曾接待过他,他们之间有过通信。喜龙仁在给法国收藏家杜伯秋的信中说,他觉得20世纪50年代的敦煌壁画临摹得很好,甚至有些比张大千早些时候临摹的还好。

除了北京,台北故宫也是他的目的地。1956年5月,喜龙仁与负责台北故宫文物赴台的庄严,合影于台北沟渠旁,这里是故宫文物赴台后停留的第一站。

这两次考察,借了瑞典1950年便与新中国建交的光,让他接触到众多新材料,其中既有麦积山、炳灵寺壁画与雕塑,也有两岸故宫的清宫旧藏书画。在此基础上,喜龙仁决定创作一部全新的中国绘画通史,也就是他的巅峰之作《中国绘画:大师和原理》。在这本书的序言里,喜龙仁还特别感谢了王逊。

为了出版这本书,喜龙仁亲赴各大公私收藏考察,获取相关藏品的高清照片,还鸿泽而渔似的购入图册。即使在此书出版60多年后,书中收录的一部分图版仍然是首次公开发表于中文学术界。

2003年,永定门城楼复建,一筹莫展之际,一本英文版的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提供了详细的记载和实测图。时隔近80年后,这些数据和图纸,仍能成为复建的重要依据。

今天,当我们站在北京仅存的几段城墙前,或许会想起那位百年前远道而来的瑞典学者。他用一个异乡人的眼睛,发现了北京城最深沉的美;他用一个学者的执着,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永恒的档案。在时光的长河中,记忆被悉心珍藏——这,或许就是摄影与历史的意义。

最新的好消息是,喜龙仁后代将约35000张照片和25000份文件捐赠给瑞典国家博物馆。这些珍贵的资料,从2019年开始陆续扫描公布,目前已公开了超过90%。

“24箱书信已经扫描了21箱,已经有3860通喜龙仁与世界各地人士的通信,大概5900张纸公布出来。”叶公平说,喜龙仁书信大半是英文,还包括瑞典文、丹麦文、德文、法文、意大利文、中文和日文等,难以辨认的手写书信也占很大比例,要想利用这些档案,还得潜心研究才行。